

【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定位、内涵与特征

胡庚申 王 园

【摘要】生态翻译学既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征,又表现出一种取向于生态化论域研究的趋势。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建构逻辑定位于三个关联互动的核心理念:“翻译即文本移植”(取向于译本)、“翻译即适应选择”(取向于译者)与“翻译即生态平衡”(取向于译境)。对应于上述三个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聚焦在“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三生”主题,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生”为内核、以“生命”为视角、以“转生再生、生生与共”为特征的“尚生”认知方式。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及其建构逻辑呈现出明显的生态整体论的特征与优势: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以及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实践表明,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可以为探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开辟新的认识论视域与方法论路径。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生态范式;共生体

【作者简介】胡庚申,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院长、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会长(河南 郑州 450001);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二级教授,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国际跨文化语用学、英语语言文化教学(北京 100084);王园,郑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州大学生态翻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生态翻译学(北京 100084)。

【原文出处】《外语教学》(西安),2021.6.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译学的生态视角研究”(项目编号:08BYY007)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创新、国际化发展及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BYY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引言

生态翻译学是翻译研究领域中一个正在兴起的生态范式,它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基础,是翻译研究中一种整体性研究的尝试,也是一种生态范式的科学探索。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迎合了全球生态思潮,有利于充分汲取“东方生态智慧”,再加上“关联序链”的认知路径以及“生态理性”的具体指导,目前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新成果(冯全功2019)。当代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具有复杂的研究构成,既有文本维度的研究,又有译者维度的研究,还有译境维度的研究。因此,明确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审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揭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这些便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构建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2.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定位问题始终是探讨生态翻译研究意义的基本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求解,不仅表明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自身选择,而且也涉及生态翻译学自身的学术定位和论域关注。事实上,当代生态翻译学在认识论意义上已将其研究范式定位于“生态范式”,将翻译定位于如下三大核心理念:“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这三大核心理念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在更广泛意义上被共同体认知和理解接受的、由核心词语构成的话语”(李国俊等2013:30)。按照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推而论之,生态范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生态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基本模式,是一整套关于“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三位一体”的思维结构。它预示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具有整体性方法论特征与生态化方法论特征。显然,生态范式不是指翻译研究的某种具体的翻译分

析方法,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翻译理论,而是以生态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统领和关照翻译行为和翻译研究,是一种从新生态主义视角综观和描述翻译的研究范式(胡庚申 2019a)。

2.1 翻译即文本移植

“翻译即文本移植”的理念表明,文本移植是一个动态的翻译过程,它不仅涉及到文本离开原文生态环境而转移到译文生态环境的适应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被转移的文本是否能够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而获得“再生”的生存问题。因此,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是互生共存的,文本移植的最终目标就是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文本是否获得新的生命力在于文本的“可移植性”(transplantability)。可移植性是指文本从原语的翻译生态环境移植到译语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后,呈现出相对应的文本生命,并使之能够生存、承受与适应现有翻译生态环境的能力与潜力。这里的可移植性,可以借用钱钟书的“不隔”来表达其生态要求与生命特点:“‘不隔’并不是把深沉的事物写到浅显易解;原来浅显的写来依然浅显,原来深沉的写到让读者看出它的深沉,甚至于原来胡涂的也能写得让读者看清楚它的胡涂”(蔡新乐 2002:7)。因此,“翻译即文本移植”就是致力于探寻文本在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之间相应结构与功能的内在移植。从文本生命来说,将文本移植到新的生态环境之中,就意味着文本生态的选择性适应与重构,也意味着“移植”才是译语生态得以重构、译语文本得以生存和长存的真正契机。文本移植是文本在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之间的移植行为,它在移植翻译过程中已经形成多层次的行为系统,涉及移植前的适应选择、移植中的选择适应和移植后适应生存。具体来说,“移植前”侧重在对拟翻译文本进行适应性选择,以提高适应原文生态结构的可移植性;“移植中”是将原语生态(包括语言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交际生态等等)匹配到译语生态之中,“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事而异”地进行适应性改造与适应性重构;“移植后”则指被移植文本的生命状态适应了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之后而能够“适者生存”、茁壮生长与生生不息。当然,文本移植活动这三个阶段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有时又是交叉进行的。对移植行为的复杂性分析本身就隐含着对移植行为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重视,移植行为会随着翻译生态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涉及多层次的演化因素;文本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诞生与成长是文本移植的内在要求与追求目标。因此,文本移植正是在这种要求与目标的作用下,才使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融合为一个多维度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演化系统(胡庚申等 2019b)。

文本移植是基于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生存状态而运作的,其意旨就是关注被移植文本能够在多元化环境中“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对“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追求,其实就是让翻译成为一种朝向未来的生存,是一种共生互存、和谐统一的生态。这里,文本移植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译者生存之间的演化与发展,都将文本与译者、译境等各种翻译因素视为一种复杂适应系统;其中,移植行为是伴随着文本生命的诞生而发展的,它促使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换句话说,文本移植就是基于文本生命在新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而发生动态的移植行为,其行为结果恰如道金斯(Dawkins 1976:14)所谓的“稳定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stable)。这样,文本移植具有如下显著特征:1)生态长效性,使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成长与生生不息;2)适应能力强,使文本生命能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而“适者生存”“稳定者生存”;3)竞争能力强,表现为被移植文本的多元化生存与译本的“再生”状态,这就使得文本生命在“自我”与“他者”的碰撞与融合过程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可移植性从而在异域中再生与成长。可见,文本移植是一个跨域境的生态行为,围绕着有关文本生命在跨域境中所表现出的、前述的生态长效性、适应能力强和竞争能力强等特征,由此便形成一个有机的翻译生态系统,并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和谐性、统一性、整体性与多样性。

2.2 翻译即适应选择

适应与选择是翻译活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彼此之间又是关联互动的。对于适应与选择的互动来说,选

择造就了复杂的适应,既需要选择性适应,又需要适应性选择。从根本上说,“适应”的是原文、原语与译语所呈现的翻译生态环境,它通过“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使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互动具有“适者生存”与“强者长存”的生态效率,在翻译生态环境中具有“汰弱留强”与“择优求存”的生存能力与生存趋势。“选择”也并不是针对单一的原语或译语,而是针对包含原语与译语所呈现的整个翻译生态环境,是针对包含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互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因此,“翻译即适应选择”表征了适应选择的优先性存在,表明了翻译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上的适应选择活动,是一个动态的复杂适应系统,它是由适应与选择构成的,并以持续不断的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为策略通向文本生命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的驱动下,翻译既基于适应选择,又源于适应选择。适应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适应的发生是通过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的影响来实现的。适应的生成机制是译者的选择,而译者选择的结果是适应。在适应选择过程中,译者的适应不再被简单化,而是被置于动态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而“译者则是整个复杂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和适应性的主体,并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韩红建、蒋跃2017:21)。

在这个复杂适应系统中,任何适应活动与选择活动都是基于具有“活性”与“学习能力”的适应性主体(Adaptive Agent)——译者,其适应性体现于译者的主体性、积极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等特征。译者既要“适应”,即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又要“选择”,即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译者适应的目的是实现文本生命的诞生、生长与再生;而译者选择的法则是“汰弱留强”,让文本生命在新的翻译生态环境中获得“再生”而生生不息。因此,译者的适应选择就是译者的生存境遇;译者的生存境遇就是接受“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与检验。因此,“翻译即适应选择”的认知思维方式不是把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看作是截然不同的分离体,而是以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的多元融合为特征构成一个动态的翻译生态系统。这样,“翻译即适应选择”理念不仅摆脱了传统翻译的语言转换的认识思维方式,建构了以适应选择为阐释指标的、多维转换的认识思维方式,而且使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获得了新的内涵:译者自身融合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统一共同体之中而成为具有适应性的主体,即“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做出判断、由译者自主地做出适应性选择”(胡庚申2013:205)。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作为生态取向和自然生态的一致性,并将其看作是从生态学视角、以适应与选择为核心理念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综观的生态范式。

2.3 翻译即生态平衡

生态翻译学所关注的“翻译即生态平衡”,其翻译取向是生态范式的,其意旨就是保持翻译生态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之间的平衡和谐,这正应合了“生态学的精髓是整体平衡、和谐共生”(方梦之2011:2)。平衡本质上就是翻译的一种和谐状态,它内在地包含协调、融通、调和、互补等属性,而和谐则是以翻译过程中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平衡为其实现形式的。因此,翻译是一种基于“和谐平衡驱动”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生态化活动。这种生态化活动涌现于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翻译生态之间的区域互动,涌现于原语生态与译语生态之间的区域互动,构成一个由文本、译者和译境共同作用而生成的翻译生态系统。这样,翻译生态环境在生态范式的驱动下以“能动者”身份出现,更加强调译者、文本与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动态交互与和谐共生。生态翻译学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戴桂玉、蔡祎2018:93)。

首先,“翻译即生态平衡”强调的是译境对译者与文本的影响。译境不仅积极地影响着译者的适应选择活动,而且主动地改变文本的生命状态以促使文本适应新的翻译生态环境。译境对译者与文本的影响和改变并不是简单性的参与作用,而是整合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为综合因素参与作用,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对译者生存境遇的提升和文本生命状态的“再生”过程的积极作用。其次,“翻译即生态平衡”强调译者对翻译

生态环境的影响,即文本生命的生态位建构。生态位建构体现了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积极塑造与建构,借此实现了译者与文本生命、翻译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存共生。具体而言,生态位反映某一生命体在群落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居于生态位的每一个生命体均占有各自的生境空间和营养位置,发挥各自的功能作用(岳中生 2019)。这样,在生态位建构中,译境与译者、文本是相互作用的一个整体,任何一方面的改变就会引起另一方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而达到“翻译即生态平衡”理念所导向的和谐平衡。因此,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积极塑造,反映了翻译生态环境在译者的生态位建构中发挥着“能动者”与“参与者”的作用。它不仅影响着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而且也受到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的影响。这种相互作用既体现了“翻译即生态平衡”的生态范式属性,也体现了翻译生态环境趋向于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正如陈东成(2018:7)所说:“翻译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多样性、创生性、动态性,各要素交相感应、相生相克、生生不息,其理想状态为‘保合太和’。”因此,只有从生态范式的视角看,翻译生态环境的积极作用才能被揭示出来,也才能进一步为翻译实践活动的和谐性、多样性、生态性与多样性提供合理的解释。

3.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可以说是发现和解释翻译本质的新研究范式的一种探索,其视域下的翻译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翻译理念整体性揭示的,已有的翻译理念包括“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翻译生态系统。诚如其名,这三种翻译理念各有侧重,“翻译即文本移植”要回答的是“翻译意味着什么”“翻译是什么”的问题,是基于“文本生命”的移植活动,强调的是“生命”思维方式;“翻译即适应选择”要解答的是“谁在做翻译”“怎样做翻译”的问题,是基于“译者生存”的适应选择,其思维方式的关注点在于“生存”;而“翻译即生态平衡”要追寻的是“翻译应当成为什么”“怎样做好翻译”的问题,是基于“翻译生态”的整体追求,强调的是“生态”思维方式。基于此,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生命共同体,成为一个三者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生存性结构:文本生命与译者生存离不开翻译生态,也会反过来影响翻译生态;同时,人们关于文本生命的认识与理解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基于这个生命共同体,“生”便构成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共同内核;而“生”的基本内涵包括三个维度:文本生命之“生”、译者生存之“生”与翻译生态之“生”。这里的“生”意味着生命、生存与生态的三位一体性,是一种生命性、生存性与生态性的状态或品质,它强调翻译是一种文本生命在异域中延续、再生的状态,是一种从原文生命的“既济”状态延续到译文生命的“未济”状态,从而获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层内涵就是“生”,“生”构成了翻译实践活动的基本法则与典型特性。这样一来,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就是以“生”为视角来考察翻译及其过程与现象,以“生”为线索对翻译展开研究,它强调“生”既是翻译研究的出发点,也是翻译研究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可谓“尚生之道”。

传统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从狭义的翻译过程来探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从既定的翻译结果来考察“译本是如何被接受的”等问题,往往缺乏对文本生命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生成历程的关注与探寻(刘云虹 2018)。事实上,翻译所面对的是动态的、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如果只是通过静态的“文本”来考察复杂的翻译现象,那么翻译本质就难以得到本真的理解与把握,翻译本身蕴含的“生”(包含诞生、生成、生存、再生)也就被遮蔽了,其蕴含的生生不息之生命源泉也就丧失了。翻译活动历来就被认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活动,但是,这种复杂性的学科却一直在用简单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所以,其结论往往缺乏解释力和指导性(吕俊 2013)。生态翻译学旗帜鲜明地以“生”取向对翻译进行整体性的探讨,旨在不断地激发译者的主体行为,以“文”为基、以“人”主行、以“境”酌情,能动地做出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因此,以“生”为出发点,就可以普遍地延伸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的三维空间,横跨译本、译者、译境的三重空间,因而翻译是由文本

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共同造就的。以“生”为轴心,就可以摆脱仅仅关注“译本是如何产生的”或者“译本是如何被接受的”单一性问题,促使翻译研究从静态的“文”向动态的“生”转换,既可以显示出对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整体性考察与探究,又可以显示出生态翻译学对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生”关系的总体理解。因此,“生”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内涵的内核,围绕此内核,以新生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与理解文本的生命特性、译者的生存特性与翻译的生态特性。

简言之,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内涵取向于“生”,以“生生”为向来理解与诠释翻译,是一个以“转生再生、生生与共”^①为典型标志的生态范式研究。

4.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特征

通过上述基于对“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的阐述与分析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有机融合提供一个以“生”为取向的视角来把握翻译本质,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的诞生、生存、再生与生长。与传统翻译把“文本”作为探讨的出发点不同,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以其倡导的“生”,作为翻译理解与翻译诠释的认识前提,强调翻译的生命特性、生存特性与生态特性。随之而来,生态翻译学便呈现出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特征。

4.1 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

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所呈现的多元的、整合的、关联的复杂性方法论,是基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上而形成的以“生”取向(life-oriented)的认知方式。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的出现,促使译学界不再拘泥于简单性的方法论来观察与探究翻译现象与翻译行为。以“生”取向,就是既要考察文本的生命状态,也要关注译者的生存境遇,还要注重翻译的生态整体,这种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超越了在认识论上“非此即彼”的单一方法论,也摆脱了二元对立下“有序、分割、理性”的简单性思维模式,对翻译过程中的文本、译者、译境三大要素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给予了生命性的、生存性的与生态性的综合考察。因此,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是一种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协同作用的生态化研究路径。

作为一种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根源在于翻译实践活动的共生性。翻译主体(译者)与翻译对象(文本)、翻译生态环境(译境)是一种动态的共生关系。在这种共生的翻译实践关系中,翻译对象向翻译主体不断展示其生命本性;翻译主体也向翻译对象不断展示其生存本性,而翻译生态环境又向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不断展示其生态整体性,这样一来,译者、文本与译境就需要在共生关系之中相互协调与相互平衡,从而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可以显见,所谓以“生”为取向,即是把翻译视为一种“生命”“生存”和“生态”的基础,在此基础上认识和理解翻译的生命特性、生存特性与生态特性。可以说,这样的理路为在解决翻译复杂性过程中使用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找到了理据,而对于探索可持续和多元化的研究形式来说,也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4.2 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

在翻译学领域里,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主要表现为译者与文本、译者与译境、文本与译境及其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问题。生态翻译学是以“生”取向来考察翻译的生命性、生存性与生态性,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者在一个有机的、和谐共生的系统中相互作用提供了一种生态范式。这种生态范式不仅可能有效阐释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的关联互存,而且可能厘清一条贯穿于翻译始终的“生生”“共生”线索。翻译的“生生”“共生”蕴涵着翻译的多样统一、动态平衡、整体关联以及文本的生命、译者的生存和翻译的生态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多层次、多维度、复杂而又整体的动态关系。这样,“生生”“共生”就成为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视域下理解翻译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成为把握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一种存在方式。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超越了“语言学转向”视域下的单纯的语言转换分析,也超越了“文化转向”视域下的文化语境分析,它把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作为一个有机和谐的共生体,这种和谐模式的共生体是以生态整体的共生状态展开的,又是以和谐有序的生态化形式发展的。在翻译过程中,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是互生共存的,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译者与文本、译境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共生形态。这种共生形态强调的是翻译的“生”,进而体现了文本生命之“生”、译者生存之“生”与翻译生态之“生”。因此,蕴藏在翻译活动和翻译行为之中的,便是文本生命的有机出现、译者生存的主体出现与翻译生态的整体出现。如此一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便融会贯通了译者与文本、文本与译境、译境与译者,从而使三者统一于和谐共生的翻译之中。

4.3 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

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是把翻译视为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和谐共生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下翻译的本体。和谐共生意味着,翻译生态是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文本生命并非孤立地存在,需要在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在异域中获得诞生与再生;译者生存是以翻译生态为基础而展开对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与再生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在共生形态中就能和谐地展开其生态化活动,而生态化共生便构成了翻译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即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从本体论角度来看,“共生”构成了生态翻译学生态范式的生态化实在,这是一种关于共生和谐的生态化实在。由此而来,一种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随着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而应运而生,它超越了传统翻译学以文本为本体的简单性思维范式,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为三位一体的和谐共生,实现译者与文本、译境的生态化融合与共生性统一。

简单性思维范式下的翻译得到的所谓“文本”是静态的、确定的,它不可能是翻译的本来面目,而只能是人们头脑中直观想象的“文本”实在。这样一来,就人为地制造了文本与译者、译境之间的鸿沟,导致了认识论上的认知误解。这其实就是语言学派的“文本化”本体论的表现。当语言学派受到西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响而将文本当作一个封闭性实体进行分析时,研究者很快就发现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无法覆盖言语的动态性和开放性(钱纪芳 2016)。自从文化转向和解构主义范式诞生以来,翻译学研究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与翻译本体渐行渐远,越来越紧密地附着于他体之上(刘性峰 2016)。这其实就是文化学派“文化化”本体论所体现出翻译研究的缺陷。而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吸收语言学路向与文化路向的研究优势,坚持以“共生”为翻译的本体,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为基点,确保翻译的本质不是孤立自在的“文本”,而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体,是译者与文本、译境之间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生态化过程中生成的生命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应该不是传统翻译的文本化本体论,而表现出一种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主张翻译回归“共生”。这里的“共生”,意味着翻译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活力,意味着翻译的和谐共生关系已经建立;也就意味着翻译是以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的共生关系为基础,建立了翻译的跨域面联系;翻译的本质也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转换,而是在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相互作用中生成的和谐共生性。更为重要的是,翻译的和谐共生也不再是文本、译者与译境之间的外在联系,而是通过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而实现的生态化过程;翻译的本质正是在这种生态化过程中形成了和谐共生性,由此使翻译过程越来越呈现出生态范式特征与生态化特征。

5. 结语

21世纪初以来,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建构历经了风风雨雨,不断在解惑释疑中砥砺前行,“但作为原创理论,生态翻译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构建自己的理论话语的积极探索(蓝红军 2018)。伴随着翻译研究的不断深

入发展,在全球学术生态化思潮的推动下,生态翻译学的内涵将得到进一步深化,其凸显的生态范式也将获得新的生命活力。通过分析与考察,生态翻译学视域下的“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与“翻译即生态平衡”三大核心理念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生态范式属性。基于这三大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的深层内涵表现为“生”,它聚焦于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共生,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复杂的翻译现象与翻译过程,也有助于我们挖掘翻译的诞生、生成、生长与再生。由此,生态翻译学研究范式拥有其自身的显著特征:一是多元的复杂性方法论,代表了以“生”取向的认知方式;二是有机的和谐式共生体,是建构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之间和谐共生关系,汇聚了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域;三是综合的生态化本体论,体现了生态翻译学以共生为本体论基础,深化和完善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并为翻译的复杂性研究提供了生态思维范式。正是由此,立足于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范式,翻译并非是一个孤立封闭的“文本”论域,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彼此交织,我们将翻译理解为一种以“生”取向的诞生、生成、生长与再生的生态化过程,所显现出的是由译者、译本、译境共同“绘制”的一幅完整兼容的生态图景。

注释:

①其中的“转生”(trans-live),意将原作的生命“移植”(transplant)到译作中去,“转”(trans-)一字有动感,可指生态翻译行为;“再生”(re-live),指生命“复活”的状态,可视为生态翻译的效果。由此,“转生”与“再生”就构成了生态翻译的“生生”连续体。而“生生与共”既符合“共生”的生态学基本原则,更能体现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涵义为“不能把原作生命和译作生命截然分开、二者应具辩证统一的共生关系”,这也是生态翻译学的宗旨所在。综观之,“转生再生、生生与共”概括了生态翻译学的翻译行为和翻译效果,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的宗旨和理念。若使用英文表述生态翻译学以“生”取向(life-oriented)的上述标志性特征,笔者姑且将生态翻译学的“转生再生、生生与共”英译为:The ecological disposition to let the text trans-live and re-live.

参考文献:

- [1] 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2] 蔡新乐. 翻译学研究的一个盲点: 翻译哲学的形而上之维——从翻译学的方法论到本体论刍议[J]. 中国翻译, 2002(5): 4-7.
- [3] 陈东成. 基于《周易》哲学思想的翻译研究[J]. 上海翻译, 2018(6): 6-9.
- [4] 戴桂玉, 蔡祎. 认知图式理论关照下旅游文本的生态翻译研究——以广州旅游景点介绍的中译英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4): 92-97, 107.
- [5] 方梦之. 论翻译生态环境[J]. 上海翻译, 2011(1): 1-5.
- [6] 冯全功. 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与作用分析——以生态翻译学为例[J]. 上海翻译, 2019(3): 38-43.
- [7] 韩红建, 蒋跃.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下的翻译观研究[J]. 中国翻译, 2017(2): 19-24.
- [8]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 诠释与建构[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9] 胡庚申. 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J]. 中国翻译, 2019a(4): 24-33.
- [10] 胡庚申, 孟凡君, 蒋骁华, 边立红, 李素文. 生态翻译学的“四生”理念——胡庚申教授访谈[J]. 鄱阳湖学刊, 2019b(6): 26-33.
- [11] 蓝红军. 从学科自觉到理论建构: 中国译学理论研究(1998-2017)[J]. 中国翻译, 2018(1): 7-16.
- [12] 李国俊, 魏焜, 韩天澍. 技术批判语境下哲学的生态范式转向[J]. 学术交流, 2013(5): 28-31.
- [13] 刘性峰. 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嬗变、问题及对策[J]. 外语研究, 2016(2): 87-91.
- [14] 刘云虹. 翻译定位与翻译成长性——中国文学外译语境下的多元系统论再思考[J]. 外国语, 2018(4): 94-100.
- [15] 吕俊. 开展翻译学的复杂性研究——一个译学研究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革命[J]. 上海翻译, 2013(1): 1-6.
- [16] 钱纪芳. 基于太极图式的和合翻译思想之“象”体系建构[J]. 上海翻译, 2016(4): 1-8.
- [17] 岳中生. 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J]. 上海翻译, 2019(4): 17-20.